

第1版
2015年5-6月 总第69期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USA)

世界文化論壇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1540-2339
地址: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 www.postmodernchina.org

有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上)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 菲利普·克莱顿 教授 (Philip Clayton, Ph.D)

本期主要内容

有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上)	第1版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黑土地(上)	第1版
一个中国生态主义者在美国	第2版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宣言(下)	第2版
见证克莱蒙式的生态文明“有情”共同体	第3版
回归自然、回归他者、回归自我	第3版
将静观带入你的生命中(十三)	第4版
做健康人而非经济人	第4版
思想的盛宴	第4版

一、无限增长神话的破灭

自人类文明诞生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人类在地球上的扩张和统治并没有对地球本身形成威胁。虽然人类逐渐控制了其他物种,但我们的力量对于征服整个地球来说仍是相对有限。甚至在100多年前,对于人的需求来说,地球上的资源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然,在摧毁和破坏力方面,自然的力量仍然十分巨大,甚至是非常可怕的。仅在几年前,日本发生的地震和海啸摧毁了一个国家所建造的自认为是坚不可摧的防御系统,这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大自然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来自太空的事件,比如说一颗主要的小行星所引发的事件,仍然远在我们的掌控之外。然而,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个星球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状况已经发生了。人类现在在已经真切地遭遇了增长的极限。

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发现人类力量是有限的。人类自身已经从根本上依赖于油气资源(碳氢化合物),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全球的油气储量将在2050年耗尽。作为一个生物物种,我们无法离开饮用水而生存。然而,地球上大量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正在不断减少,且已经低于人类的正常需要,这严重威胁到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我们所依赖的不仅仅是水,还有清新的空气,但是现在人类已经改变了整个地球的大气层,同时,这一切还在不断地扩展和蔓延。地球上几乎没有任何地方是人类所不能达到的,撒哈拉大沙漠,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山峰,甚至大洋的深处也都深深烙上了人类的印迹。

西方经济体系的基础是建立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虚拟假设之上的,问题是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假设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无限性。然而,正如我们所见,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已确定无疑是有限的。事实上,大多数庞大的跨国公司,包括石油巨头们早已知道了他们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即将消耗殆尽。由于经济的过分增长使得我们的发展已经日益达到了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杂乱无章的倒塌和崩溃只会更加严重和频发,这种过度增长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性是极其严重的。

考虑到这些事实,就不难看出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当中,为什么经济理论很有可能是最重要的课题。在地球上,影响世界各国领导人的经济理论绝大多数都是基于需求的增长。只有当全球经济继续以目前的速度不断增长,当前的社会和公民生活方式所依赖的一整套经济系统才会继续正常运转下去。这一当前经济体系的基本原理几乎适用于每一个经济单位——从20国集团的宏观经济模式,到跨国公司依赖的经济运作方式,到在某个一个国家内做生意的中型公司,再到特定的城市和国家的预算,甚至一个小镇的店主。

21世纪人类文明的整个经济体系都建立在增长的基础之上,但是地球已不能继续承受下去了。没有任何简单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一矛盾,它是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最基本的矛盾。经济模式中的调整、小的变化,政府监管中温和的措施并不足以去消除我们现行

的自以为成功的经济模式和现在已经达到的增长的极限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只有建立一个从根本上转变的全新的理论框架,像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才可能使经济发展重新回归到现实的运行轨道上来。

二、寻求文明的转变:一种有机哲学

有机马克思主义增加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没有提到的一种方式。作为与具体文化的嫁接,有机马克思主义鼓励更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保持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同时,有机马克思主义坚持与时俱进,即以思想的独特性来适应他们在当代的传播。

当然,有机科学是有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盟友。但是,传统的价值观、文化,甚至是宗教信仰也可以成为建立后现代有机哲学的同盟。如果我们所赢得的别一种强劲的经济替代方案足以抵消全球石油资本主义毁灭性力量的话,那么我们将需要建立起与所有新旧传统思想和实践的联盟,这一联盟则有利于社会更加公正和可持续地发展。

接受有机哲学,需要做出人们从现代到后现代范畴的转变。大多数现代哲学都在研究排他的逻辑,而不是包含有机整体的逻辑。例如,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宗教人员永远不能在一起和谐地工作。毕竟,马克思曾说,宗教是一剂“精神鸦片”,麻木了工人的意识,使他们认识不到自己所处的真实状况。因此,为了彻底改变经济状况、转变政治体制和提升社会条件,现代欧洲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战胜宗教,在现代主义盛行时期,宗教确实犯有支持殖民主义和建立不公正等级制度之罪。美国北部的主流宗教基督教往往倾向于把他们所建立的拥有高尚灵魂的先知耶稣转变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基督教世界对其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排斥,导致了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仇外心理。现代基督教更倾向于寻求权力和实现统治,而非致力于其创始人所期望的个人本性的救赎与社会全体的正义。相比之下,在后现代文明当中,这些对立和冲突正在被重新审视。例如,中国学者现在正在了解西方宗教,并期盼是否他们可以帮助建立一种新型的价值观念,即生态世界观。现在,美国的很多后现代宗教人员相信共产主义的哲学立场,并认为它比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更接近犹太先知的价值观和耶稣的预言与教诲。

这仅仅是关于有机思想何以可能的新型联盟的一个例子。作为一种致力于寻求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替代方案的后现代世界观,有机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了对古代和后现代、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宗教与哲学这些思想联盟深刻见解的基础之上。联盟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正在向西方现代主义和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主导假设发起挑战。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最重要的盟友就是过程思想。在西方,过程哲学指的是由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1861-1947)创立的一个主要哲学流派,这个学派的核心思想是:所有生命、所有存在和所有经验都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存在,或者说是由

一个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所构成的:“有机哲学的根本在于完全抛弃了动在作为变化之中永恒不变主体的概念。同时,把动在看成是一种主体的经历和在经历之中自身所获得的经验,即动在既是经验的主体,又是经验的受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一古老的信条被扩展了,没有人可以思考两次;同时,把这一理论普遍化,即没有任何主体可以经验两次。”

在怀特海看来,有机哲学有三层核心内涵:

(1)内在联系。人类不是孤立的个体和单个的原子,我们总是相互“内在地联系”着。正如怀特海所说,“这种内在联系是一个事件何以发生和如何发生的原因……每一种联系都构成了事件的本质;因此,脱离了这种联系,事件也就将不会是它本身了。”[3]更准确地说,一个社会、文化或民族构成了它的成员,而不是说,一群独立的、离散的个体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社会、文化或民族。这种“人是关系的存在物”的观点与“每一个人都是孤立的个体”的现代主导价值观个人主义相反。西方世界产生了许多糟粕的观念,但是或许没有一个观念可以比个人主义的破坏性还大。

(2)不断变化的过程。过程哲学的第二个中心思想是:没有事物是一尘不变的。想象一下我的朋友美筠处于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三个不同的时期。当然,青少年时的美筠与15岁的那个年轻女孩是相联系的。但我们不能说这两者是完全相同的,她的外貌、思想和她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在之前和之后有某些相似之处。青少年时的美筠和成年时美筠的关系同样如此,她性格中的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不断表现出来,例如她的智慧、亲切和对家庭的忠诚等。不过,她的一生仍然在不断变化,没有事物是一尘不变的,你和我都是如此。如果非要找到不变的话,那么唯一持续不变的就是过程本身。

中国人比西方人更容易接受过程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西式思维总是强调时间的统一性,第一个建立了西式思维模式的古希腊哲学家就明确宣称:只有不变的才是真实的。因此,正如柏拉图在他著名的对话录《理想国》中所说的那样,任何正在经历的变化都不是真实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更是一种错觉。早期的基督教思想家也有类似的论断,他们认为每一个体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灵魂构成了人的本质。一个人所有的变化,包括她的外貌、文化和她所经历的不断变化的思想和感情,都不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当然,问题产生了:我们的这些变化是我们自身及我们周围的人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过程哲学则强调回到那些对于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即在人生无止境的旅途当中的所积累的新经验、汲取的新思想、遇见的新朋友、形成的新见解等。

(3)整体主义。除了内在联系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之外,过程思维还强调整体主义。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这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洞见。老子在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黑土地(上)

——一个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王治河 高凯歌 韩秋红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全国各省一季度GDP指数显示,2014年GDP增速位列全国倒数的东北三省,2015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依然未见起色。辽宁省一季度GDP增速仅1.9%,位列倒数第一,黑龙江和吉林则分别位列倒数第四和第五,三省GDP增速都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此低速的增长不禁让人联想到了黑土地的“贫穷与落后”,是强度不够还是力度不行,GDP评定后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大风暴,因而顺理成章,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按照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开的药方吃药,启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出口,而实现这一切的根本就必须是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刺激消费。只有生产和消费的数量在不断膨胀,数字才会不断刷新,GDP的增速才能提高。大力发展资源消耗型经济,同时刺激民众过度消费,不断推动原材料的消耗率和废品产出率的上升,这便是西式现代经济增长之路的应有之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经济增长的标志——GDP增速翻倍。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种现代经济增长之路真的像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描述的那么美好么?这种建立在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基础之上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真能够推动东北黑土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吗?有机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现代经济增长神话的破灭

有机马克思主义又称过程马克思主义,它是当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和过程哲学家为了应对现代性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从有机整体概念出发,依据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而提出的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新发展。[1]这是一种强调有机联系,追求人与

自然共同福祉的深度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在这种深度生态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现代西方经济体系的基础是建立在经济无限增长的虚拟假设之上,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假设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无限性。然而,大量科学研究数据表明,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已确定无疑是有限的。事实上,许多跨国公司包括石油巨头们早已知道了他们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即将消耗殆尽。[2]由于经济的过分增长使得我们的发展已经日益达到了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态危机的光临。正如美国企业社会责任领袖大卫·施沃伦所说,如果财富是以一个人的健康和我们的地球的生机为代价的话,那它就是没有任何价值的。[3]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就对人类突飞猛进并不断增长的工业文明发出了警告:文明若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在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只是荒漠。[4]当前,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正在不断蔓延,这些并不是词汇的堆砌,而是已经实实在在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西式现代化给世界带来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生态危机。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定程度上也沿袭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老路,特别是在经济发展中,过分强调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忽视了经济发展成果的质量和所产生的环境成本,从而导致了城乡发展失衡、社会阶层收入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等一系列不良现象的出现。中国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先生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所产生的巨大灾难十分担忧,他说,中国如果继续走西方工业文明的老路,只能是死路一条,因为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基础比西方还要差很多,再走下去不仅影响世界和谐,还会造成内部不

和谐。[5]

因此,继续走现代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老路,则就意味着要进一步加重其给我们带来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相当于是在选择死亡。全球气候变暖已不可逆地发生了,它将断送上万年来良好的自然环境。[6]

这一切无不表明继续现代经济增长之路的结果则是通向了暗无天日的地狱深渊。因此,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呼唤一条新的发展之路,著名有机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克莱顿教授曾提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灭亡,就像凤凰从灰烬中浴火重生一样,迫切需要和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以及社会和谐相处的新方式,即生态文明。生态文明将极大地超越和扬弃现有的发展模式,塑造全新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引领和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7]落实到黑土地的发展,生态文明则呼唤我们换跑道,走一条厚道发展的新路。

三、生态文明呼唤一种厚道发展之路

从有机思维出发,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唤善待生命,这包括对自然厚道,对他人厚道,对子孙后代厚道。站在这样一种厚道立场,有机马克思主义反对黑土地继续走反生态的不厚道的死路,主张黑土地的发展则应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顺应生态文明的大潮,充分利用黑土地的政治、道德、文化和资源优势,特别是它浓郁的集体主义传统和重情厚义的文化基因,走一条可持续的厚道发展之路。

1、借建设生态文明的东风,发展新的社会评价指标和体系

鉴于传统西式GDP的弊端日益凸显,所带来的危害日益加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是到了将GDP

请下神坛,让其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了。用柯布博士的话说,GDP已到如此地步,还迟迟不对之加以变革是没有道理的。“以人类幸福为代价来提高世界生产总值的做法应该停止了”。[8]因此之故,对西式GDP替代品的寻求已是世界性的潮流。

1972年,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发明了“经济福利尺度”的概念;1989年赫尔曼·达利和小约翰·柯布、克利福德·柯布父子随后又研究出了“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9],即后世所称的“绿色GDP”。1995年,克利福德·柯布进一步研究出了“真实发展指数”。这些新型指数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努力挤出GDP中的水份,其中包括扣除国防开支、自然资源退化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有的绿色GDP指数还增加了志愿者服务、犯罪率、休闲时间、公共设施年限等。

由此可以看出,绿色GDP体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和和谐统一的程度,实施绿色GDP核算,有利于真实衡量和评价经济增长活动的现实效果,克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GDP唯上”的政绩观,增强公众的环境资源保护意识。

黑土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特别是大小兴安岭地区,依然保留了部分原始森林的痕迹,森林覆盖面积处于全国前列。如此可观的资源优势,却在“黑色GDP”的评选中屈居末位,难道必须要适应工业化“石油GDP”的号召而破坏现有的青山绿水了吗?或许“绿色GDP”的新社会评价指标可以为黑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现代社会的压力使得人类对生命的蔑视程度愈发严重,轻生和犯罪现象突出,商业巨(下转第3版)

征 稿 啓 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想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電子稿件地址:ipdclaremont@yahoo.com 網址:www.postmodernchina.org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劉全華 曲躍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唐力權 鞠寶兒 安樂哲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顧問:葉秀山 叶朗 朱德生 周桂錕 乐黛云

一个中国生态主义者在美国

深圳大学 王晓华博士

1

飞机在洛杉矶上空盘旋。透过窗子俯瞰下面的群山，上面的道路清晰可见。它们伸展、交叉、分延，消失于目力所不及的远处。其踪迹之曲折，恰似我此刻的思绪。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抵达机场的我已经有些恍惚，像深海鱼类般潜游于陌生的国度。在似乎高及天穹的大厅里，我随熙熙攘攘的人流前行。到了关口，负责检查的白人男性官员例行公事：“你到美国做什么？”“发表有关生态主义的演讲！”看到他疑惑不解的样子，我换了个说法：“跟大学生谈环境保护。”他笑了：“欢迎！”对于这种反应，我早已习惯了：在广州美国大使馆和中转的台湾中正机场，同样的答案犹如通行证，使我得以顺利通过911后最为严苛的申报和审查。

那是2002年4月初。当时，生态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个陌生的词汇，但我此行的目的确实与它有关。自1992年开始，佛教、原始瑜伽、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相互交织，汇聚为一种改变了我生命轨迹的思潮：人不能无限制地盘剥万物，他/她应该成为地球村的守护者。我将它命名为生态主义。在寻找精神资源的过程中，美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从背景中凸显出来。与倡导碎片化的衮衮诸公不同，它的倡导者真诚地追问：“如果我们想要在宇宙中如同在家，应如何做？”在《后现代科学》等书中，他们给出了诗意的答案：“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大仓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这些表述富有生态主义意味，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一种力量牵引着我。我迅速完成了书评《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此文被《南方周末》和《世纪中国》推出后，我接到了封神秘的来信，信来自于王治河先生。他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后来赴美读书并就职于克莱蒙大学的过程研究中心，辅佐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看到我的文章后，他有意邀请我去访学，但又不知道我的电子邮箱，便向《世纪中国》网站的编辑求助。于是，便有了此后的神交。经过数年的准备，我最终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班机。

上午9点，机场的出口处，一个亚裔青年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我快步走过去，大声打招呼。他叫雅亚，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留学生，专程来接我。中等身材，棒球帽，黝黑的面孔，说话时经常开朗地大笑：雅亚的形象朴素、亲切、平和，让刚踏上美国土地的我毫无拘束之感。短暂的寒暄过后，这位新朋友领我走向停车场，发动了他那辆老掉牙的捷达：“引擎还是不错的！”此言不虚：宽阔的加州公路上，银灰色的轿车在西部歌曲的节奏中奔驰，大有“春风得意车轮疾”的意思。后来，我知道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都会买二手车。它们被尽可能地用到老旧，直至耗尽最后的生命力。在我抵达洛杉矶的那天，王治河的老爷车雪弗莱恰好健康状况不佳，无力到高速公路上重温往日的雄姿，雅亚那辆年纪略轻的捷达才派上了用场。

半个小时后，抵达小城克莱蒙，见到了王治河夫妇。王治河个子不高，面容瘦削，谈吐儒雅，但举手投足中都透露出一种执着劲。他的妻子樊美筠形象温婉，姿态典雅，仿佛刚从唐诗宋词中走出来。她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美学教授，曾任师大哲学系副主任，却于事业如日中天之际随丈夫来到美国，加盟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大家族。见到来自国内的我，夫妇俩开始尽情地言说汉语。共进午餐之后，他们送我到房东莎丽家。莎丽是个60多岁的家庭主妇，个子不高，慈

眉善目，住在公园旁一个绿树掩映的平房里。在签订租约时，老人家轻声细语地给我上了堂环保课：“看看这3只颜色不同的桶，分别放有机、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垃圾。”此刻，角色似乎出现了意味深长的翻转：宣传生态主义的学者变成了学生，家庭主妇当起了老师。后来，我知道莎丽的生态意识不是来自书本，而是反映了一种绵延已久的城市精神：克莱蒙位于圣·盖博山脉脚下，100多年前的还是寸草难生的荒漠；人们引水灌溉，种植花草，培育树木，最终建造出名列前茅的“全美最佳居住地”；在这个只有3.7万人口的小镇中，保护绿色是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譬如，政府规定：每家盖房时，必须拿出总预算的30%用于房前屋后的绿化。再如，为了获得树木的荫护，人们很少盖两层以上的建筑，大多数房子都掩映于绿色之中。我去时正是4月，小城里四处盛开的鲜花传达着热烈的生之愉悦。

除了7个之外，克莱蒙还盛产博士。城市虽小，却聚集着树的高等学府，人均学历高居全美榜首。一代名优梅兰芳就曾在此获得名誉博士学位。根据事先的安排，我美国之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拜访各路高人。为了便于行动，王治河给我配备了绿色的交通工具——一辆自行车。入住莎丽家的第二天，我就骑着它直奔过程研究中心而去。中心位于克莱蒙大学一座白色小楼的底层，旁边就是停车场。它如此谦卑，只占据了裙楼的角落。若不是门上挂着“过程研究中心”的牌子，你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特殊之处。

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中心聚集着小约翰·柯布、大卫·格里芬、斯普瑞特奈克等大师级人物，堪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神经中枢。当天我要见的约翰·奎因也是位奇人：精通哲学，兼任洛杉矶绿党领袖，却又甘愿做中心的普通职员，专门负责吾等访问学者的日程安排。55岁的他面容谦卑，言语却异常犀利：“梭罗说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用的盘子减为5个，我认为我可以减到1个。”这类表述寓意深长，使我产生了探索此君内心的强烈冲动。此后的日子里，他成为我交往最多的美国学者。随着了解的深入，一个生态主义者的日常生活场景如卷轴画卷徐徐展开：总是穿着褐色的西服，开两门的微型车，住60平方米的小房子，看13英寸的电视，衬衣穿到实在太破才扔。既使在克莱蒙，这也显得有些另类，以至于55岁的他还是个单身汉。不过，相处久了，你会对他心存敬意：当别人试图尽可能快地耗尽物的使用价值时，一个生态苦行僧却选择了珍爱和守护，这不正折射出圣人才有的情怀吗？

认识了奎因之后，日程表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拜会小约翰·柯布和大卫·格里芬。正在休假的格里芬住在百里之外的圣·芭芭拉。我决定首先见柯布教授。那时，他已经卖掉了原有的豪宅，捐出大部分存款，和太太简爱入住当地的老年社区。在那个绿树成荫的栖居地，他们拥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小房子。当我于上午10点走进略显逼仄的客厅时，映入眼帘的木柜、沙发、茶几都积淀着岁月的痕迹。76岁的柯布先生曾被美国长谷大学哲学系主任蒂文·柯尔称为“真正的南方绅士”，先生面目清瘦、身材瘦削、彬彬有礼，坐在他长期陪伴的事物中间。这是人和物的共同体：在开始对话之前，一个世界已经向我透露它的秘密。接下来的访谈水到渠成，两个人很快进入正题。我首先询问生态主义一词的英文译法，他耐心地解释：“这种思潮历史短暂，可能没有特别合适的英文对应词，每个译法都可能引起误解。”这种说法等于承认了我的先锋性。深受鼓励的我开始谈论后期海德格尔，还透露出由衷的崇拜之情。闻听此言，他笑

着说：“海德格尔虽然是旷世大哲，但并没有穷尽一切问题，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此言不虚：自1969年开始自己学术生涯的“生态转向”，他撰写了《21世纪生态经济学》，提出了绿色GDP概念，创立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都超出了海德格尔的思之国度。这些问题将对对话引向新的维度。不知不觉间，2个小时过去了。

谈话结束后，他邀请我参加老年社区的免费午餐。穿过绿树守护的小径，我们走向一个面积很大的社区食堂。在那里，几个精力旺盛的老人倾听了他的介绍：“这位是来自中国深圳的王晓华教授。他是中国生态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领军人物”固然属于溢美之辞，但激起了老人们的浓厚兴趣。不少人围过来，好奇地提出各种问题，俨然把我当成了中国的象征。后来，我才知道其中缘由：这个养老社区叫“朝圣地”，以采用自治模式著称于全美；治河喜欢称它为“后现代绿色社区”。它拥有160多个社团，其中的“有机农业小组”更是声名远播；听说中国的生态主义者前来做客，老人们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每当想起这个细节，一句格言就会回旋于耳边：“道相同，何远之有？”

2

一只手从门板里伸出来，随时在欢迎到访者。这不是惊悚电影中的画面，而是真实的生活场景：镶嵌于木头中的艺术品产生了逼真的效果，象征着生态主义者的开放情怀。

看到上面的景象时，我和王治河已经驱车上百公里，抵达海滨小城圣·芭芭拉，站在大卫·格里芬教授的“生态屋”前。白色的小楼面朝大海，周围是绵延的沙滩、远接云天的碧水、绿树。据王治河介绍，这正是格里芬所追求的生活：作为柯布的弟子，他喜欢田园诗般的生活，亲自设计了实用面积约为110平方米的2层小楼。为了与背景和谐，更为了体现生态主义理念，建筑中的一切都尽可能保留事物的本色：墙只刷了白漆，家具只进行了简单的打磨，金属的垃圾桶从不与垃圾袋联姻；屋内没有空调和电暖气，完全通过建筑技巧来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在介绍自己的设计美学时，格里芬教授有些犹豫地说道：“这体现了我所说的生态意识。”我注意到了“我所说”这几个字的修辞学功能：既亮出自己的立场，又时刻准备征询他人的意见。后来，我发现：反复使用这种修辞方式，体现了典型的格里芬式言说风格。

在2楼不大的客厅里，我和格里芬相邻而坐。当时的他已经63岁，但依旧活力四射。他中等身材，面色红润，谦逊的笑容难掩锐利的思想锋芒。与内敛的柯布相比，格里芬更喜欢直抒胸臆。当我谈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时，他几乎一字一句地强调：“如果中国重复美国道路，那么，你们或许永远赶不上美国，因为后者早出发了近200年。你说呢？”这些英语单词像子弹般击中了我，使我体验到了真切的痛感。在本能的民族主义者情绪支配下，我试图证明“追上”的可能性，但他脸上的笑容显现了内在的执着。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他试图“唤醒”包括我在内的中国人，不愿中国重蹈西方的覆辙，希望她直接进入生态文明阶段，但这激发了我的辩论欲。为了舒缓正在显现的话语张力，他请我们共进午餐。从烤箱中拿出意粉与奶酪的混合物后，格里芬式的语句再次传入众人的耳中：“这是我眼里的生态食物。”这次，大家没有什么异议：依赖这些细小的创新，已经成为素食主义者的他依旧精力旺盛。对于怀疑者来说，他神采奕奕的形象就是宣言书：无需伤害动物，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宣言（下）

——评达利和柯布的《21世纪生态经济学》

王治河

二、对GDP崇拜的颠覆

与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21世纪生态经济学》对笔者的另一大震撼是其对GDP崇拜的颠覆。

所谓“GDP崇拜”是指对GDP的过度迷恋，对物质财富增长的不惜一切代价的盲目追求。GDP的增长高于一切，GDP几乎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21世纪生态经济学》对GDP的颠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GDP提供了一幅扭曲的经济图像，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经济福利，公平和正义在GDP中的缺席，GDP对自然权益的忽视和践踏，GDP对社会和文化代价的漠视。

（1）GDP并不能真实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的经济福利，它提供了一幅扭曲的经济图像。

这体现在：一方面GDP包括了诸如犯罪、污染、健康问题的代价、事故、家庭破产等众多“坏的东西”。例如，战争期间往往是GDP大幅度提高的时期。尽管人民饱受各种牺牲和苦难，包括身心受到摧残和食品的匮乏。此外，地震和海啸也是GDP增长的推手，因为医疗费用支出的上升，特别是大规模的房屋重建都会使GDP飙升。另一方面GDP也排除了许多“好的东西”，如家务劳动、抚养孩子、做饭、清洁、打理房子、帮助亲友和邻居、做义工等不付工资的行为。所有这些行为虽然是在市场之外的，然而它们却是人们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

俄裔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曾经说过，将一种复杂的情况过分简单化是危险的，对国民收入的衡量就是这样一种过分简单化的行为，在量上越精确，越简单明了，越容易“误导社会”。用GDP来衡量国民收入就属于这种幻觉和误区。当问题关涉对立的利益集团的冲突时，这种“过分简单化”就变得格外“危险”。而在达利和柯布看来，GDP所衡量的只是福利的某些层面，“因此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福利的指标，忘记这一点就是典型的措置具体性谬误。”

更令人吃惊和匪夷所思的是，“我们不仅失之于计算这些代价，而且常常明确地把它们算作利润，诸如我们把清理污染作为GDP的一部份。”按照《幸福经济学》作者马克·安尼尔斯基的形象说法：“GDP理想

的经济英雄是一名癌症晚期的大烟鬼，他正打一场昂贵的离婚官司，他因为一边开车一边大嚼汉堡包还一边打手机造成了一起20车连环追尾的交通事故——他的所有行为都为GDP的增长作出了很大贡献。”这样“创造”的GDP，正如有学者所质疑的，除了劳民伤财，“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无疑将西式GDP的逻辑结果合理地演绎出来，同时也将西式GDP的荒唐性暴露无遗。

（2）公平和正义的缺位

历史上，公正（亦即公平和正义）一直被公认为是首要的政治美德。然而，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现代经济理论则“很少关心正义的价值”，它所关心的仅仅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患了“财物饥渴症”。它视金钱为第一追求，收入的增加被视为成功的象征。这使得GDP的拥趸对公正不感兴趣，或者说根本不关心商品与服务之公平分配。“我们几乎一意地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更大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如共同体，雇员和供货商的利益。”用墨西哥著名发展问题专家托马斯·米克洛斯的话来说，GDP的快速增长是“以收入上的不平等的增长为代价的，这既包括国内的不平等，也包括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实际上，由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更多地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富豪手里。经济学家常常争辩说，当一个社会变得足够富有，由财富增加带来的利益自然会慢慢流入穷人的手中。但是，在那些国家中，他们拿来用作成功的案例的真相是：大量的穷人生活的改善主要是从政府和工会的作为中获益的，这和现代经济理论的主张丝毫不相吻合。按照柯布博士的分析，以GDP的增长为旨归的现代经济是一种鼓励“贪婪”的经济，在根本上它是一种“把贪得无厌作为预设条件的经济，我们不得不尽力去确保人们在现实中真的贪得无厌。”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公正正在GDP中缺场。

（3）GDP严重忽视和践踏了自然的权益

除了没有涵盖人们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GDP还没有计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它严重漠视和践踏了自然的权益。也许这其中最严重的代价是全球变暖，气候异常的代价。按照柯布博士的分析，以GDP为

中心组织经济不仅在导致人的幸福上是无效的，而且完全没有计入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世界范围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对森林的大规模砍伐导致短期内GDP快速增长。然而长远来看，其经济、社会和环境代价则令人恐怖的高。大规模干旱、洪水的爆发、大量水土的流失、港口和水库的大规模淤积，都是这些代价的一部分。在柯布看来，正是对GDP的崇拜使经济学家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对地球的恶化漠不关心的集团。”也有经济学家称对环境的污染破坏系最大的、最广泛的市场失败。达利在离开世界银行的离别演讲中恳切地建议世界银行停止把对自然资本的消费算作收入。“我们已经习惯了把自然资本算作免费物。这或许在昨日的空的世界是有效的，但在今天这是“反经济”的。

这种对自然权益的漠视和践踏是建立在增长是无限的、自然资源和原材料是无限的假定基础上的。然而，铁一般的事实表明，“这个星球上的自然资源绝不是无限的。事实上，大多数主要的跨国公司，包括石油企业，已经在寻找他们所依赖的自然资源消耗殆尽之后的退路了。”这种所谓的无限增长对地球来说，已经成为不能继续承受之重。正如我国有学者所质疑的那样：“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追求无限的发展，岂不是一场自欺欺人的美梦吗？

（4）GDP严重漠视了社会和文化的代价

与漠视环境的代价相联系，社会和文化的代价——破碎的家庭和破碎的文化也不在GDP的视野之内。GDP的增长让我们在心理、社会和生态层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GDP的追求过程，既是以对作为历史进化宝贵结晶的传统价值观的抛弃为代价的，也是以“民族认同的逐渐失落”为代价的，更是以社会共同体的毁灭、闲暇时间的牺牲、“休闲、审美和精神价值的丧失”为代价的。发生在许多人生活中的不幸告诉我们，仅有成功是不够的。事实上正是物质的极大成功将我们带到“一种陌生的精神和道德的破产。”GDP崇拜之所以能导致社会道德体系解体，是因为GDP崇拜的核心就是使一切事物货币化、金钱化。当厚道的“以人为本”被任性的“以钱为本”取代的时候，当金钱成为

我们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从圣·芭芭拉回来以后，我完成了此行的前期使命：倾听。下面，更大的挑战等待着我：完成有关中国生态主义运动的英文演讲。它是过程研究中心的独特安排，体现了生态主义者孜孜以求的对话意识：中西方学人进行角色互换，原来的倾听者获得了主动言说的机会。对于我来说，这无疑巨大的诱惑——可以越过语言的藩篱，直接向西方听众发声。为了不辱使命，我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居所门前的克莱蒙公园行人稀少，成为本人锻炼演讲技艺的训练场。通常，听众只有一只尾巴漫长的松鼠和几个心不在焉的乌鸦，但我依然口中念念有词。回到莎丽的家，她就升格为口语教师。每当她处于阅读和劳作的间隙，我都会趁机讨教发音上的问题。为了万无一失，我还请王治河校正了演讲稿。他在纸上圈圈点点，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文字踪迹。回头来看，那是个人友谊和民族情怀的双重见证。

不过，尽管获得了如此强大的精神援助，临近演讲的我还是感到志忑。海报贴出后，听说若干企业家、记者、律师要来听讲，顿觉压力山大。

5月7日下午4点10分，演讲正式开始。走进位于巴特勒楼的哈登会议室时，早有准备的我还是感到吃惊：观众席上坐着几十个老人，白发相连；恍惚间，似乎有云彩浮动；几个年轻人置身他们中间，显得格外醒目；柯布教授选择了最靠前的位置，不时朝我投来信任的目光；王治河则手持相机，边拍照边做鼓励状。主持人说完简短的开场白以后，我开始了此生的首次英文演讲。这是个回归原始言说的过程：没有投影机 and PPT，剩下的只有声音和动作。紧张在所难免，舌头和牙齿时常交战，西装掩饰了躯体的轻微战栗。随着话题的深入，听众被带入到西方的中国：环境压力，觉醒者的地平线，照进现实的生态主义理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的绿色共同体。此后，听众专注的姿态意味着无声的鼓励，兴奋代替了紧张，言说的激情主宰了我。不知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演讲进入对话环节。台下的听众们纷纷举手，各自表达心中的疑惑：

“中国的蝗灾问题会不会影响粮食生产？”

“实行退田还林政策以后，剩余的农民去哪里？”

“年青一代外出打工，他们的父母由谁来照顾？”

说到外出打工的青年把钱寄给父母时，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美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孩子很少赡养父母，父母倒是要给孩子钱。”这种群体情绪延续下来，形成了强大的气场。它虽然使话题暂时偏离了生态主义，但却增加了对话的张力。规定的时间到了，我仍被提问者环绕着。一位白发女士还特意过来致谢：“你的微笑很迷人！”

演讲结束后，美国之行的主要使命宣告完成。此后的日子里，一个汉语学者开始了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漫游，足迹延伸到西部沙漠、黄石国家公园、拉斯维加斯，阅读的范围扩展到文学、法律、政治等诸多领域。随着了解的深入，我逐步标绘出了美国生态文化的谱系：从爱默生到梭罗、利奥波德、卡逊、辛格、柯布、格里芬，再到奎因、莎丽等普通公民，一个珍视生命的家族排出了长长的队列，日益人丁兴旺。

离开克莱蒙时，已是五月底。路边的不少树木结出了果实，但大多数居民不会采摘它们。根据约定俗成的规矩，那是留给鸟的食物。在告别的时刻走过如此丰盈的大地，目睹这样无私的赠予，我的内心也变得充实起来。

衡量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尺的时候，社会道德的滑坡和塌陷就注定成为一种必然。不难看出，在人类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黑色GDP”，不仅仅是一颗“苦果”，而且日益成为一颗危险的“炸弹”。因此，将GDP请下神坛，就成为一种必须。用柯布博士在《21世纪生态经济学》的中文版序言中的话说，当GDP已到了如此地步，还迟迟不改，“是没有道理的”。

三、追求一种以共同福祉为旨归的共同体经济

除了带来震撼，《21世纪生态经济学》也给我们带来感奋和希望。因为它提出了一种追求共同福祉的共同体经济学，提出了包括绿色GDP在内的许多建设性的方略。这与大多数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性的匮乏形成鲜明的对照。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对于个体的孤绝所产生的弥漫于世界中的空无来说”，有意义的共同体不失为一个健康的选择。有机马克思主义旨在“探索人们彼此创造性地生活在一起的可能性。”有机马克思主义称这种共同体为“共同体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成员对于他者的共同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如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小家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样。与此同时，整个人类共同体也对地球共同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离开地球，“我们无法存活”。有机马克思主义深信，共同体的健康决定了个体的健康，决定了生活之质量。由于人类共同体是更大的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更大共同体的健康，对我们所有人也很重要。

基于这种对有机共同体的强调，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一种共同体经济以超越经济主义。那么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经济的目标是什么呢？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经济学的优先考量，对“共同的福祉”（Common good）的追求被视为共同体经济学的首要目标。其核心就是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共荣以及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作为发展的根（下转第3版）

见证克莱蒙式的生态文明“有情”共同体

——记第十届国际怀特海大会暨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

河北工业大学 高茜

2015年6月4-7日，第十届国际怀特海大会暨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美国加州著名的生态城克莱蒙市成功召开。

克莱蒙的景美：6月2号我就到达了这座美丽的生态文明城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这里的环境优美，到处都是绿色，到处充满了美丽；这里的树很多，而且很茂盛，大多数是热带植物，枝繁叶茂，使人能明显地感受到这里的植物与人类有多么地和谐！这里很像中国的热带城市三亚，但是这里比三亚更为凉爽，适宜人的居住；这里的空气清新，清澈透明，能见度高。我们居住在克莱蒙大学联盟的培泽学院（Pitzer College）学生公寓，从窗口往外看，似乎山就在窗外，其实，这些山离我们住的地方蛮远的。对比一下，今天的北京，天气不好的时候，能见度就几百米。作为中国的首都城市，我们要做的生态文明建设还任重而道远。这里到处充满生机和活力，走在校园里，你能看到树上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它们自由自在地在校园里的大树上玩耍，不会看到有人来就跑，甚至有时候还会静静地待在那里，似乎在等待我们给它拍照。由此可见，这里的植物、动物与人是多么地和谐相处！

在学术大会结束之后，我们去参观了世界著名的过程哲学研究大本营——“过程研究中心”和柯布先生提议建设的生态屋。在过程研究中心，人们都在上网、看书、交流，让人感觉在这里人与人之间没有多余的想法，就是专心在钻研学问，探索知识，讨论学术问题。在生态屋参观时，工作人员说，他们几天就能建起一间这样的生态屋。这些生态屋冬暖夏凉，且特别环保，不用任何钢筋和水泥，而且防震。试想：如果我们不破坏大自然原有的生态，以如此先进的生态理念来建造我们的城市，那该有多好啊！

克莱蒙的人善：来到那里，每走到一个地方，不认识的人都会友善的跟你微笑，主动向你问好。在6月4号，听完晚上的开幕典礼以后，我、学姐同我们的院长自己漫步在校园里，一起回学生宿舍，夜色有点黑，第一次从开会地点回到我们住宿的地方，结果迷路了。正当我们感觉无助时，看到有一辆车从对面开过来，在路边停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手拿文件的7旬左右的老人，他貌似到家了。我们跑上前去，询问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怎样才能回到我们住宿的地方，我们原来远离了回去的路，走错了方向，不知道当时在哪个地方。这位老爷爷给我们讲了半天，我们表示还是不太清楚，老爷爷就邀请我们上车，开车带我们回到皮泽学院我们住宿的地方。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都很感动，愿意给老爷爷一些报酬，以表示感谢，老爷爷委婉的拒绝了。我们问他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明参加第十届国际怀特海大会暨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老爷爷说过程研究中心的柯布，是他最尊敬和敬重的学者，不要报酬，这就算是学习柯布精神。看来，柯老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想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这里的人非常和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和谐，表现出一种怀特海式的“有情”共同体！

克莱蒙的老人——小约翰·柯布先生：在这次大会上，我很荣幸有机会见到柯老，这位著名的生态哲学家、“过程研究中心”的创办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也是值得我们最为尊敬的老

人。这次生态文明大会是已90岁高龄的科老自筹资金举办的，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0余名专家学者、环保组织者参会。人类社会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许多人都想改变现状，有好的想法，但是他们的努力处于碎片化状态，所以，柯老“想把人拉到一起，共同努力，推动世界向好的方面转变”，为此，柯老渴望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跨学科会议，和人们一起讨论生态哲学、生态经济学、生态农业、科技在生态文明中的作用、朝向生态文明社会的教育体系、生态美学等诸多问题。为举办此次大会，3年多前柯老就开始利用个人积蓄和私人捐款等方式筹集资金，为大会如期举行做准备。在几天的会议中，已经年近90高龄的柯老全程参与了会议，而且精神焕发，思维还很敏捷。他做演讲的时候，表达的都是对全人类热切的期望和真诚的祝愿，也希望我们人类能在这个星球上，能够世世代代过着幸福的生活！在他登台讲话时，大会堂里所有的人都自发地站起来，为这位值得人们敬重的老人热烈鼓掌。在他讲话过程中，大家一直都在认真地听讲做笔记！在会议期间，你会发现这些来自30多个国家的1200多名专家学者，很多都是年迈的老人，大多头发花白，有的还行动不便，需要家人或会务人员的帮助，但他们都从赶来听会议演讲。在这里，你会发现和真切地感受到真学者是什么精神，真正想听学者演讲的人是什么精神。在学者的演讲过程中，每每讲到精彩的地方，即使有些学者自己站站不稳，却仍然还会站起来，向演讲者致以最热烈的掌声。因此，在会上让我特别感动的不仅仅是演讲的内容，更多的是这群可爱的参会人。

在会场外边，我们很幸运地2次见到了帅气且精神焕发的柯老先生。柯老走路步履轻盈，一点都不像是90岁的老人。我们很激动地跟柯老合影留念，柯老自始至终都很热情的微笑，一点都没有架子，完全是一个和蔼可亲的爷爷。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如此德高望重，又时时处处为人着想，让人感动的活菩萨，我的心灵的震撼无以言表。

克莱蒙学到的生态文明知识：在本次学术会议上，有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在大会上做报告。其中有美国著名环保领袖吉本（Bill McKibben）博士，印度著名生态哲学家希娃（Vandana Shiva），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John B. Cobb, Jr.）博士，世界著名后现代农学家弗罗伊登博格（Dean Freudenberger）博士，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格里芬（David Griffin）教授，有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克莱顿博士，另类诺奖得主、后现代农业先驱杰克逊（Wes Jackson）博士，国际美学学会会长卡特（Carter）博士，《当公司统治世界》的作者柯顿（David Korten）博士，耶鲁大学塔克（Tucker）博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设性后现代研究中心主任王治河教授，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中国部主任、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樊美筠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学会副理事长刘孝廷教授，中国环保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李远博士，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修玉博士，北京大学吴国盛教授等。作为一名研究生一年级的年轻学子，我很荣幸有机会参加

如此盛大的国际会议，在这里见到了这么多厉害的大人物。

在会议上，我们听到了最新的研究发展数据和成果。针对当代世界生态文明的现状，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给我们提出了对生态文明的希望。麦吉本博士作了“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气候变化”的大会报告，小约翰·柯布博士作了“对全球危机的一种怀特海式回应”的报告，范达娜·希瓦博士作了“科学在全球危机中的误区”的报告，廖晓义作了“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生态政治学”报告，韦斯·杰克逊博士作了“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生态农业”的报告，大卫·格里芬作了“怀特海的世纪”的报告等。这些报告启示我们，应该更快地行动起来，深切认识人类当下面临的生态现状，用正确的过程哲学有机哲学理论去指导我们的行动。会上介绍的潘多树及其启示对我们也震动很大。生长在北美的这种潘多树，几百公顷，庞大的森林，已经巍然屹立于地球8万多年，是当今地球上生命最长的有机体。为什么它们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们它们是根系相连的生命共同体，实际上它们是一棵树。由此遥想我们人类：我们人类不是同一种物种吗？我们之所以能生在地球上生存，也源于我们是同一个人类，我们的根是同一个。但是，可悲的是，当今世界划分为民族国家，政治家们以“人民”的名义在争权夺利，导致世界不和平，人类不和谐，工业文明又导致大自然受到严重危害，生态面临严重危机。今天，即使是最乐观的人，也已经从越来越频繁的灾难中感受到危险。因此，如何借鉴潘多树的生存智慧，这无疑是一个思考方向。我们如何重新认识人类统一的根系，全人类联合起来，共同面对人类共同的生态难题，坚定不移地走生态文明之路——抓住这种新的选择，新的机遇，这既是本次大会的主题，也是对我们全体与会人员的最大启示。面对生态灾难，面对工业文明的恶果，我们并非别无选择，而是可以有新的选择。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告诉我们，走生态文明之路，是迄今我们所能认识的最好的一种选择！

90岁高龄的会议发起人小约翰·柯布先生在大会上恳请和呼吁世人，一定要把建设生态文明看作今日人类的头等大事，抓住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现在行动起来，还为时不晚！为此，首先要改变我们在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传统思维方式，真正以实际行动来建设生态文明。虽然在2015年6月7日这一天，第十届国际怀特海大会暨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克莱蒙市圆满结束，但我们相信全球范围的生态文明行动才刚刚开始。我们坚信，生态文明建设正在进行中，会越来越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在2015年6月7日均刊发重要新闻，指出美国著名生态哲学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6月5日在会议上发言时认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很多方面，中国都可能成为领导者。我希望其他国家可以学习中国的经验。”作为一名中国学生，在看到这些报道后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我也殷切地希望中国的城市建设者学习美国克莱蒙城市建设经验，致力于建设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有情”共同体。

（上接第1版）头华为、富士康等知名公司跳楼事件频发，那些正值青春年华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却在资本家的压榨和贪婪中早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是家庭的不幸、社会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同样也说明了过分单向度地追求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个人和集团的利益膨胀进而将人异化为机器，使人丧失其本性，从而在精神上发生强烈的刺激进而崩溃的做法是严重成问题的。但这就是“黑色GDP”考量的直接衍生物，蔑视生命，进而追求最大规模的数字暴涨，最终的结果定会导致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这就警示我们，在发展新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时，要高度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包括被尊重感，尊严感，责任感，归属感和幸福感，这就要求我们引入“幸福指数”的概念，进而让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指数成为衡量该国家和地区人民幸福程度的重要指标。

虽然黑土地GDP增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东北地区的“全国文明城市”和“最具幸福感城市”却是连年上榜，由此可见，单纯的GDP衡量并不能够反映出—个地区的真实水平，“黑色GDP”给黑土地带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这种以牺牲人、自然和社会的健康为代价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是“成问题的”[10]，我们不能继续走这条现代经济增长的不归路。就如一副方子出现了许多严重的副作用，再坚持“照方吃药”，就成了对病人的不负责了。[11]以“绿色GDP”和幸福指数为主要内容的新的社会评价指标是克服“黑色GDP”所造成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一剂良药，黑土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原始风光，同时拥有高幸福热情的开朗的人民，这些都是黑土地生态文明转化的特定优势。

生态文明应该保证广大民众的幸福生活，中国政府若能黑土地计划单列，将东三省作为生态特区来建设，用新的社会评价指标体系即“绿色GDP”和幸福指数衡量东北地区的发状况和考核干部的政绩，那么黑土地的发展将会别开生面。一个繁荣发展的东北既为整个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生态纵深，也会为日益发展的中俄贸易和中俄联盟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撑，其意义自不待言。2、大力发展“共享经济”

西式现代经济理论标举独占思维，其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独占式的经济模式。由此人沦为为了财富的奴隶，人被异化成了独占式经济的牺牲品。这种独占式经济模式同样是现代经济无限增长的始作俑者，独占式经济造成了消费结构的畸形增长，过度浪费现象频发，且愈演愈烈，当前的地球已经达到了增长的极限，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经济范式的转变也迫在眉睫。从强调相互联系的有机思维出发，立足于高科技特别是互联网大潮，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分享思维，主张大力发展“共享经济”。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共同的地球之上，所有的生态都是互通的，通过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断地维持着生命的延续，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产物，都不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存在，由此，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推重的共享经济中所蕴含的分享的智慧便显得尤为重要了。就连斯密也曾说过：人们如果只追求个人利益，而不顾及他人利益，那么个人利益也难以实现。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占有式经济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真实写照，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则为尊重他人，不言而喻，有机马克思主义在产生之初就将他者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之上了，因此，这种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享经济必将会使分享的智慧尽情绽放光彩。

由此不难看出，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推重的“共享经济”对于打破资本主义现代经济无限增长的神话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资本主义主导地位和个人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所无法相比的，也是黑土地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障。（未完待续）

（上接第2版）本内容。

在《21世纪生态经济学》中，达利和柯布主张把经济人看作共同体中人（Person-in-Community），而不是纯粹个体。主张从理财产学（Chrematistics）向家政学（Oikonomia）转变。家政学要求人们“从共同体整体需求角度看市场。”这是一种让经济为社会服务，为共同体服务，为环境服务，为我们的后代服务的经济学，试图使人类的经济活动从属于地球及其居民的福祉。这类类似于我们中国古人对于“经济”本真的理解。这意味着要拒绝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经济主义，寻求那种“大写的增长”的福祉”，又关怀整个星球的健康与生机。

因此之故，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经济学反对经济主义将满足人的需求当作唯一目的，反对把自然当作工具，反对用工具理性的态度对待自然。地球的健康，包括地球上各种居民的健康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经济不是统治自然，而是应该为作为整体的系统的福祉服务。这当然也包括了满足人类的需求服务，但这种满足不应该以严重伤害整个生态系统为代价，应将这种伤害减少到最小。

相应地，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经济学主张从榨取经济向有机经济转变。这包括有机耕作，支持共同体的农业，太阳能和氢能系统，生态城市，现行高耗能汽车的消除，乡村经济的恢复等等。

共同体经济学欣赏传统文化的许多智慧，鼓励建立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和乡村共同体的繁荣，但绝非要人们回到前现代社会，也并不排斥贸易，既要提供有意义的和让人满意的工作，又要提供足够的商品和服务也是它的基本目标。然而，与经济主义注重经济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相比，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经济学更加推崇市场地方化，鼓励民族经济，鼓励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鼓励当地居民的积极参与，主张繁荣地方共同体。因为在它看来，当经济的命脉掌握在地方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经济的发展才更可持续，当地方居民能够自己决定自己所在共同体的繁荣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创造力将发挥得最大，其幸福感也最大，这样的发展也才最美。

毫无疑问，考虑到西式现代化对地方共同体的大规模摧毁，《21世纪生态经济学》对有机共同体的推重和呼唤，其重大理论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然而，遗憾的是，作者对共同体与个体之间的张力重视不够，对传统共同体抑制个体发展的一面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此外，在作者所给出的极富创意的绿色GDP即书中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方案中，情感维度基本不在场，这不能不说是该书的一大缺憾。

这启发我们在设计和发中国式的社会评价指标和幸福指数时，不仅要有机共同体的繁荣发展作为首要的考量，而且要高度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包括被尊重感，尊严感，责任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之所以要高度重视人们的主观感受，是因为按照有机马克思主义，宇宙不是死物质的堆积，而是情感的海洋。人不仅仅是个物质的存在，更是一个情感的存在。正像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菲利普·贝利所说，人不是活在“数字中的”，而是活在“感情中的”。同样，一个没有审美要素的GDP或幸福指数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中国式的幸福指数应该继承中国文化中浓厚的生态美学传统，鼓励人民学会欣赏自然之美。因为大自然不仅赐予我们生命，为我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食粮，而且用她丰富多样的美滋养我们的灵魂，陶冶我们的情操。美可以使我们超越自己的欲望，寻求与那些比我们更大的生命体结合在一起，从而找到生命的归属感。这无疑“幸福”的题内应有之义，值得我们发心追求。（全文完）

回归自然、回归他者、回归自我

——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刘一博

有多少人因盲目生产而忘记了善待自然，有多少人依旧将人类、社会与自然区分得干净彻底？在持续工业化的今天，我们与自然越走越远；有多少人关注我们身边人的喜怒哀乐？有多少人在意他人的感受？在追求效率的今天，我们守护着“貌似自由”的孤独；有多少人依旧认为财富积累越丰厚，过的就越幸福、越自由？有多少人依旧认为不管是物质上的消费还是心情上的变化，都是出于自己的自由选择？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更多的选择出于他者。客观来说，我们行为、思维，甚至生活方式，都并非自主选择，我们大多数人都被少数资本家远程操控，整个世界上演的就是一场提线木偶剧。这种现代性使本该清晰的边界变得模糊难辨，使简单的行动变得复杂，使欲望得不到充分满足，使自然变成毁灭人类的工具，人们用焦虑影响了欢乐。然而，有机马克思主义倡导的回归自然，回归他者，回归自我的生活方式，则为处于焦虑当中的人们开辟了新的道路。

也就导致了现代性错误的生活方式。有机马克思主义将其理论扎根于生态文明建设，呼吁回归自然，彻底转变人们的机械思维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旨在观念、思维上的转变，进而推动实践和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的彻底转变。有机马克思主义将人类重新送回大自然的怀抱，颠覆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思维，建设人与自然这一有机和谐的生命共同体。强调人类是生态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万事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内在价值，都有其存在的特殊意义。

因此，当这些观点转化为人的意识之后，就会给予人们全新的生活方式：不会再将自己与自然做出区分，视每一自然事物为自己的朋友，认为保护自己的根本方法就是保护自然；将人类的共情心蔓延到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无论看到动物还是花草牛羊，心中都会充满关爱、欢喜与平和；能将生活上的焦虑用大自然的宽容来稀释，深层次理解自然，用自然的特征来修炼自身的品格。

争和一味地追求绝对自由，一定会走向社会和自我的崩溃与瓦解。

而超越现代尚争文明，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尚和文明，是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全面的和谐的文明。将一切存在都视为关系性的存在，强调人类不是独立不依的个体，而是由关系构成的，人是嵌入在一定关系之中的人，万事万物相互依存，离开他者自我也无法生存。它致力于帮助现代人走出身心分裂，在人与人之间建立和谐的人缘。

这种“联系”的观念反应到现实的生活方式就是：将本该是共同体的人类又重新团结在一起，彼此关心关爱，共同温暖温暖；人们不再觉得孤单压抑，因为随时随地都有倾诉聆听的对象，随时随地都有解决问题的朋友；看见陌生人也并不恐惧紧张，可以尽情地释放共情心和同理心而不用担心是否被欺骗，人所特有的共情心是道德的源泉，当共情心如泉涌一样流淌时，人的道德水平也会走向巅峰。

定的”。在这过程中，我们非但不自由，竟还迷失了自己，我们在别人设下的圈套中已忘乎所以。

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给定的事物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并不是自由最重要的部分，自由最重要的部分首先在于想象和预见新事物，新生活的能力。在后现代的视角中自由，即自我的实现是与创新和开放分不开的，创新是自我实现的表现形式。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是回归自我、实现自由的表现。

回归自我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深入体会自己内心所感，真正了解自己的所需、所想和所虑；批判性的理解接触到的广告及任何信息，将外界所提供的和内心真正需要的进行比较，洒脱地放弃冗余项；将自己从囚禁的过往中解脱出来，开放思维，勇于向消费主义说不，拒绝单一化，用自己的创新努力走向多元和谐，学会欣赏多元差异之美，最终实现自由。

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回归自然为基础，进而达到回归他者与自我的实现。转变人与自然、人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思维，重塑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人万事万物相联系的思维模式，并深入探索人类实现自由的方法。它为现代人摸索出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态度，帮助现代人走出天人分裂、个体分裂和自我迷失的困境。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将引领人们走向一个充满新奇、欢乐与平和的自由世界。

问：为什么孤独者都非常喜欢脸书？

答：因为它是唯一的一个地方他们可以对着墙说话而不

必被视为一个失败者。

读书乐

将静观带入你的生命中 (十三)

东南大学 孙志海 博士

无论是传统的宗教信仰者，还是新兴的灵性修炼理论的实践者，当他们决心按自己信仰的内容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时，他们都开始了自己的修炼过程。在人们进入修炼过程的时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其第一个阶段都如同上述的那些按照某种特定的理论和理想做人或进行人格道德修养的人是一样的。其反应模式也存在向外找和向内找两种。向外找就是用自己信仰的理论和行为标准来衡量社会和他人，当然看这个社会和他人的污染，只要是好的事情、好的要求都非常认同，并努力做好。这种人在各种正统的教育理论和宗教中都会被认为是好人。还有本身也是很好很单纯的人在过去的也形成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后来通过教育和修炼已经改掉了。这两种人在向内找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发现自己所想、所行都没有错，错的都是对方，因此，向内找进行不下去。虽然他们一般情况下不会干什么坏事，伤害别人的事，但到了某个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干伤害别人的事情，只是他不会承认自己在干坏事，对方受到伤害是应受的惩罚，从而也使自己与他人处于拧劲状态，到一定时候就很难进步了。

此一阶段向内找的修养方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过程很痛苦，所改变的主要是外在的东西，人们的本质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改变，常常难以避免与社会和他人发生各种冲突。因为，通过这种修炼，虽然我们形成了新的思想观点和新的行为习惯，我们以前与社会的矛盾也大大缓解，人格形象也大大改善，但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并没有被拆除，只是被边缘化或被压入潜意识，只要人们的意识一放松，遇到外部有力刺激，或环境一变化，就会发出来，干扰人们，使人们在许多场合都要忍受

两个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的冲突，这种冲突会造成情绪和情感上的痛苦。同时，由于人们会坚持新的观念和行为习惯，又会与社会产生新的冲突和矛盾。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修养和修炼方法中，人们会很自然地对自己的思想观念采取压制措施，从而把情绪反应也压制下去，使情绪得不到完全的释放，情绪物质的堆积会越来越来，从而为各种疾病的产生埋下了祸根。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努力做好人，经常在冲突中改变自己、放弃自己的好人，会得各种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病原因，甚至因这些疾病因素的积累而早逝，出现“好人无好报”、“好人不长寿”的现象。

比如，一个儒生接受认可了“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行”这一行为规范，决心要达到这种要求时，矛盾立马就产生了。如果他是个男子，当他看到一个非常令自己心动的美女时，眼睛立即就会被吸引，即使这个女子是他完全不应该看的，也很难管得住自己的眼睛不去看。这是一种自然反应。当然，作为一个真诚的儒生，他知道自己这样的反应（行为）是不对的，就会立即把自己的眼光收回来。但眼光收回来后，心却可能还在美女身上，而且不想看的想法越重，心里想看的力量就会越大。因为在心理上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也是相等的。面对此种情景，一个真诚的儒生会产生自责，并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但当他下次再遇到这种情景时，他还会去看，然后又自责。这样几次之后，最好的状态下，会出现这种情况：见到不该见的美女时，眼光一触及到就立即能收回来，然后装着什么都没有看到，或者趁人不备时偷偷瞥一眼，但无论怎样，心理都会很想看，有一股力量让他的眼睛往美女方向瞄，由此养成虚伪的性格特征：想看又不敢看。这样一来，他要么认为孔子的那个规范根本就是做不到的，要么就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产生深深的内疚，这种自责和内疚情绪如果得不到完全的释放和缓解，会对一个人的身体造成伤害，因为那些情绪物质的堆积是各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状态的出现都表明这种修养方法是不成功的。我想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同感。同时，如果一个儒生接受了上述观念，他还会用上列观念来要求别人，即使自己达不到也要求别人达到，从而对别人的行为进行批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前面我们讲过，这种向内找的修炼方法很容易培养出虚伪的品格，其实这种修养修炼方法有时还会产生另一个完全意外的结果，那就是培养出大恶之人。在这种修炼方法中，如果一个人一心向善，真的想修好，那么他很容易培养出虚伪的人格，并使自己与他人陷入痛苦之中。如果一个人心术不正，贪心过重，那么他不仅会虚伪，而且还会利用这种方法培养出大恶之性。这是因为，这种人在进行自我修养时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良心，而是外部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如果他的智力比较高的话，他很快就能发现，如果他的言行能够符合人们推崇的理论体系和行为规范，他就能得到很多的赞赏，因此，为了得到赞赏就努力训练自己的语言和行为，积极纠正不符合人们理想的那些语言表达方式和行为。但由于他是为了得到那些赞赏才去这么做的，而不是真正为了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完善才去这么做的，所以，他很快就能发现如何利用这些理论和理想来为自己服务，用这些理论来掩饰自己的私心和恶毒之心，从而出现大恶似善、大奸似忠的情况。这也是许多一心教导人们向善的宗教（尤其是成为主流宗教时）和学派中会出现大量恶人、做出大量恶事的原因。而且这些人做恶事的程度、对社会和人类的危害要远远大于普通的恶人，因为他们有说起来的理由非常正当、当时人们无法反驳的理由，也非常善于利用这些理论来为自己辩护，掩盖自己的邪恶之心。这是那些只知道向外找的人所无法比拟的。只知向外找的人的恶别人一下子都能看到，虽然他们也能用一些正当的理由来为自己的恶行辩护，但由于他不能培育出符合人们理想的说话和行为方式，所以其恶很难瞒住众人。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某些外部的规则、标准来生活，那么，无论那些标准、准则听起来有多么的合理、善良，最后都会走向反面，成为祸害人们的根据。

这种向内找的方法还有另一个更大的缺陷，就是不能真正与向外找划清界限，常常在遇到矛盾向内找的同时或之后，还会向外找，有时则是向内找时发现自己有什么问题也会转向外部。表现为对社会和他人的批评，希望他们都按照自己的观点和行为改变自己。由于他有了“正确”的思想和言行“解决”问题、创造“和谐”局面的经验，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社会人们普遍遵循的思想、行为的危害，对其“错误”之处认识得很深，因此就产生强烈地按照自己的信仰改造社会的冲动，也会积极地批评社会和他人，从而不可避免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冲突，严重地会发生战争。这也是许多宗教徒具有强烈的传教、护教、度人、救人冲动的内在原因，也是他们常常因此做出危害他人和社会的事情的原因。

我们的经济为什么会发展成目前这个样子？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找到其他的出路。当今世界上，那些致力于建设全球经济的这些人，他们也曾考虑过其他的一些可能途径，但是最终他们并没有选择这些途径，我想现在是在时候该由我们来开始选择这些途径了。例如：18世纪的米亚顿曾经把瑞士农业和法国农业做比较开展开经济学研究。据研究，当时的法国农业是作为大的产业来经营，法国的贵族由农奴来养活。而瑞士农业则采用小农庄经营模式，人们之间相互照顾，相互关心。在小农庄中，人们对自己土地进行投入，不仅生活得更加健康，在活动和思想各方面也更加的健康。人们与自然、气候、环境等其他事物的关系都发展得更和谐。所以当时瑞士的总体状况要法国好。经济虽然影响力很大，但是经济发展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如何通过商品的生产获得最大的利益。另外一位经济学家史密斯曾经说过，个人要在经济中做出自己的决策，要在自由市场中做出自己的决策。所以从经济学发展的之初就是关于个人的，没有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甚至把个人称作是经济动物，也即经济人。这个制度在最初的时候运转的很顺利，全球的经济是按照预想的方式进行运转的，它把生产变成最大化，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但是随着这个世界越来越富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贫穷，特别在美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遇到了困难，人与社会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薄弱了。

另外一个我想提到的，就是美国农业工业化的问题。有一本关于二战的书上曾经记录过这个问题。在二战中，美国把1800万人派到战场上，这些人来自农场，这使得农场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与此同时，美国需要更多的食品，我们不仅需要为美国，还要为其他国家提供粮食，所以美国农业在那时候实现了工业化，他们尽可能少用人力，同时尽可能多的用机器，还有各种化学用品，这样他们就能够以最小的人力生产出最大的产出。所以该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并且也使得粮食产量比过去的粮食产量增高了很多。

她关于世界不同国家国民幸福观的研究引发了各国学者的深入思考。三是心路治疗的学习与实践。在大卫·施沃伦（David Schwerin）的主持下，简·里格斯比（Jan Rigsby）和罗琳·马里诺（Lorraine M. Marino）在费城为中外学者介绍了心路治疗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了被中国学者戏称为“换椅子”、“转圈圈”的有趣的团体心理活动。这次会议给我的最大启示

做健康人而非经济人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凯罗·詹森 (Carol Johnston)

但我们现在却发现，这样生产出的食品并不健康，土地受到污染，失去了以往的肥沃，能源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所用的化肥效率却越来越低。这些都是我们当年在应对紧急情况时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恶果。我们美国现在真的需要重新进行思考，重新思考农业，以实现我们更健康的生

活。另外一个是农业工业化的问题是，它破坏了农业的生活方式。富余出来的农业劳动力被迫转移到了城市，而城市却并不需要这么多的劳动力。而与此同时，农业工业化所生产出的农产品其实也不是很健康。可令人遗憾的是，直到到现在人们才开始关注和思考以上这些问题与土地有什么关系，与我们农业工业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幸运的是，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而且我们非常高兴的听到，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改变现状的项目，虽然这些项目不是主流，尤其是跟经济其他发展部门相比还不是主流，但是重要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很多人，很多有共识的人，他们正在努力重建当地的健康食品体系，不仅是为了农业发展，更多的是为了城市发展。比如说今天很多的城市农场项目，是帮助人们来解决像糖尿病这样的问题，来解决与土地相关的健康问题。

我们在贝瑞中心的工作，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启发。当然现在有很多的工作，很多人的努力，是如何改善工业农业化，如何提高农业的产量，但事实上这种农业产业化并不是可持续的，它破坏了土壤，对人们的健康不利。由于化学剂的效力越来越低，这些会对人的健康产生更多的问题。如果我们更好的来发展小型农场的话，实际上它的产量是很高的，对人是有益的。所有的这些运动都是非常必要，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其他的选择。对于如何让我们来带动和改变现有的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以上这些项目变得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我们来向人类指出这些工作和选择。如果没有这样一些项目来作为支撑和例子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还有其他选择的存在。有了这些项目，我们可以更好的思考我们的经济发展，可以有更好的经济

发展理论。我建议大家认真反思视增加产量为经济的最大目标的现代经济学，从而倡导一种后现代经济学，这种后现代经济学将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改善人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关系，谋取人和自然的共同福祉作为经济的首要目标。后现代经济学强调，我们不应该成为经济人，我们要成为健康的人。因为我们当前所看到这种经济人，他们在市场经济当中失去了很多关系。我们需要有健康的人，这才是我们经济的首要目标，如果没有健康的人，就不可能有健康的关系。一个健康的人，必须要有健康的家庭关系、社群关系，还有健康的环境，以及健康的精神生活。这些才是生命的应有之意。我们需要健康的家庭、社群和环境关系，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思考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了解几千年来，人是如何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的。但是工业化使得家庭破裂、家庭分离。我们今天听到很多人他们常年在城市里工作，与家庭、家人分离，这种分离是有破坏性的。很多人他们常年在外出挣钱养家，在美国离婚率高达50%，这是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在美国家庭规模现在也从大家庭变成了三口之家的小家庭，但是这种家庭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这使得我们的农村空心化，今天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关于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而且这样的一种发展对环境也是有破坏性的，我们需要发起一场底层运动，我们需要超越这种物质主义，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良好的家庭关系和环境就可以重新恢复，从而实现我们世界的美好和谐。人人人都想幸福的生活，人们原以为可能需要很多的物质财富，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是远远小于他们预期的。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可以学习，中国人可以从中来学习如何健康的生活，如何来建设健康的社群关系和生态环境。正如柯布博士所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从过去从历史当中借鉴，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希望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在中国建立绿色的生态，来帮助恢复我们的全球环境。

我们世界的美好和谐。人人人都想幸福的生活，人们原以为可能需要很多的物质财富，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是远远小于他们预期的。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可以学习，中国人可以从中来学习如何健康的生活，如何来建设健康的社群关系和生态环境。正如柯布博士所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从过去从历史当中借鉴，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希望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在中国建立绿色的生态，来帮助恢复我们的全球环境。

我们世界的美好和谐。人人人都想幸福的生活，人们原以为可能需要很多的物质财富，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是远远小于他们预期的。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可以学习，中国人可以从中来学习如何健康的生活，如何来建设健康的社群关系和生态环境。正如柯布博士所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从过去从历史当中借鉴，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希望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在中国建立绿色的生态，来帮助恢复我们的全球环境。

我们世界的美好和谐。人人人都想幸福的生活，人们原以为可能需要很多的物质财富，才能过上幸福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对于物质的需要是远远小于他们预期的。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可以学习，中国人可以从中来学习如何健康的生活，如何来建设健康的社群关系和生态环境。正如柯布博士所说，我们必须要考虑如何从过去从历史当中借鉴，来解决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希望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通过在中国建立绿色的生态，来帮助恢复我们的全球环境。

以“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下的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为主题的“中美后现代心理学高级论坛2014年在美国洛杉矶、费城成功举办”。来自中、美、日、韩高校的40余名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和德育专家出席了会议。美国过程心理学家约翰·伯坎南（John Buchanan）博士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樊美筠博士主持了开幕式。美国

克萊蒙研究生大学前校长约瑟夫·豪（Joe Hough）和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治河博士分别致欢迎辞。著名世界后现代思想家，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小约翰·柯布（John B.Cobb, Jr.）博士做了“走向后现代心理学”的主旨演讲。柯布博士还亲自聆听了专家学者们的发言，并现场回答了与会者的问题。他高度评价了这次会议，称：这是一次比以往任何一届会议都开得好好的会议。会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的问题是建设性后现代视域下的心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查尔斯·拉索尔（Chuck Rassieur）在“心理治疗师的道德操守”中则谈到了美国心理治疗中的价值干预。而中南大学的胡凯教授则认为：心理健康需要信仰和道德的护佑，应加强道德教育以促进人类心理健康。第二方面的问题是如何走向后现代心理学。

她关于世界不同国家国民幸福观的研究引发了各国学者的深入思考。三是心路治疗的学习与实践。在大卫·施沃伦（David Schwerin）的主持下，简·里格斯比（Jan Rigsby）和罗琳·马里诺（Lorraine M. Marino）在费城为中外学者介绍了心路治疗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了被中国学者戏称为“换椅子”、“转圈圈”的有趣的团体心理活动。这次会议给我的最大启示

她关于世界不同国家国民幸福观的研究引发了各国学者的深入思考。三是心路治疗的学习与实践。在大卫·施沃伦（David Schwerin）的主持下，简·里格斯比（Jan Rigsby）和罗琳·马里诺（Lorraine M. Marino）在费城为中外学者介绍了心路治疗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了被中国学者戏称为“换椅子”、“转圈圈”的有趣的团体心理活动。这次会议给我的最大启示

她关于世界不同国家国民幸福观的研究引发了各国学者的深入思考。三是心路治疗的学习与实践。在大卫·施沃伦（David Schwerin）的主持下，简·里格斯比（Jan Rigsby）和罗琳·马里诺（Lorraine M. Marino）在费城为中外学者介绍了心路治疗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了被中国学者戏称为“换椅子”、“转圈圈”的有趣的团体心理活动。这次会议给我的最大启示

她关于世界不同国家国民幸福观的研究引发了各国学者的深入思考。三是心路治疗的学习与实践。在大卫·施沃伦（David Schwerin）的主持下，简·里格斯比（Jan Rigsby）和罗琳·马里诺（Lorraine M. Marino）在费城为中外学者介绍了心路治疗的理论与方法，并进行了被中国学者戏称为“换椅子”、“转圈圈”的有趣的团体心理活动。这次会议给我的最大启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系全国第一家报刊传媒集团。集团成员分布在北... 企业年发行码洋近10亿元，销售收入近6亿元，销售量5万册以上图书17种，25种图书单品码洋破百万。2015年5月，集团公司成员企业北京吴福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成为“新三板第一家”，标志着中国新闻出版业混合所有制经营向资本市场迈出了重要一步。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简介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是环境保护部直属的三个国家级环境科学研究所之一。华南所始终坚持“立足华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建所方针，坚持以热带、亚热带区域环境科学研究，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区、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群、港澳台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境信息技术研发和环保产品开发等领域形成特色；在水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开发、大气污染控制理论与技术开发、水环境模拟理论与技术开发、区域大气

《世界文化論壇》报 Culture Communication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世界文化論壇》報由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2002年在美国创刊发行。面向两岸三地及北美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中國文化和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在後現代的多元時代能夠攜手對中國的永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進程做自己獨特的貢獻。

《世界文化論壇》报 (雙月) 訂閱單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 _____ 訂閱費：\$20.00/年(含郵費)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IPDC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世界文化論壇》同仁敬啟